

主持人语：君子之耕

张 沛

中国从古以农业立国，扬雄所谓“五政之所加，七赋（李轨注：七赋，五谷桑麻也）之所养，中于天地者为中国”（《法言·问道》）。与之相应，古人论政多以农事为喻，儒家尤为典型，如《礼记·礼运》篇中所说：

仁者，义之本也，顺之体也，得之者尊。故治国不以礼，犹无耜而耕也；为礼不本于义，犹耕而弗种也；为义而不讲之以学，犹种而弗耨也；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，犹耨而弗获也；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，犹获而弗食也；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，犹食而弗肥也。

当然，这不过是以农事解说政治（为政-治国）的修辞，即政治的农耕隐喻话语。在现实中，儒家又是怎样看待农耕事务的呢？

孔子的观点很能说明问题。《论语·宪问》篇中记载：

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奡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；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

南宫适以古人为问：羿、奡勇力过人，羿灭夏后，为寒浞所杀；奡为寒浞子，穷兵黩武^①，卒为少康所杀。禹、稷则反是，如朱熹所说：

^① 王夫之《四书稗疏》：“所谓‘荡舟’者，谓能乘舟以水战也。”（《船山全书》第六册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8年，第44页。）

禹平水土暨稷播种，身亲稼穡之事。禹受舜禅而有天下，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。（《论语集注》）

王夫之亦云：

今天下之论，以为古圣之道，修之而止以自困。欲争胜于天下，以自免于祸，非强勇不能。乃考之古人，则有不然者。羿以善射著，羿以荡舟闻，陆战而克，水战而雄，将谓可以并吞天下也，而相继以授首。人谁无死，而不得其死然也。禹定沟洫，稷教树艺，勤民之事，立民之命，不念及于得天下也，而夏、周继王天下，本非其有而终有之也。（《四书训义》卷十八）^①

南宫适盖以羿、羿比当世之有权力者，而以禹、稷比孔子；孔子心知其意，以谦让故不答。此不具论，且说“躬稼”。古时王者亲临农事，后成为王者（天子）主持的国家宗教典礼（祈年仪式），即所谓藉田—亲耕：

1. 孟春之月（略）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乃择元辰，天子亲载耒耜，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。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。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卿诸侯九推。（《礼记·月令》）
2. 及藉，后稷监之，膳夫、农正陈藉礼，太史赞王，王敬从之。王耕一垆，班三之，庶民终于千亩。（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）

天子亲耕，即天子行农夫事，以为万民表率；而农耕之事，则是士人—匹夫之本职，古人目为先王之法（即“天理”或所谓“自然正当”）^②

① 《船山全书》第七册，第772页。

② 古人以为圣王制法而发明“天理”，所谓“夫大人者……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”（《易·文言传》）。

而再三致意：

1. 神农之法曰：丈夫丁壮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；妇人当年不织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（《文子·上义》）^①
2. 士有当年而不耕者，则天下或受其饥矣；女有当年而不绩者，则天下或受其寒矣。（《吕氏春秋·开春论·爱类》）^②
3. 子躬耕。或问曰：“不亦劳乎？”子曰：“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饥，且庶人之职也。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，吾得逃乎？”（《中说·天地》篇）

恰恰在这个问题上，儒家独持异议。《论语·子路》篇中记述：

樊迟请学稼，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。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

这是奉行“神农之法”的农家与“宪章文武、祖述尧舜”的儒家的第一次正面交锋：樊迟“请学稼”，盖以王道之学为请；而其服膺之“王道”，正是“神农之法”。可以说，樊迟以“学稼”为名向孔子及其代表的“尧舜之道”提出了“道路的挑战”。孔子对此心知肚明，故先以不答为答（“吾不如老农”、“吾不如老圃”），所谓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而后公布标准答案（“好礼”、“好义”、“好信”）统一思想，同时也是对在场和不在场的“道路不自信”者的批评教育。

① 参见《刘子·贵农》：“神农之法曰：丈夫丁壮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；妇人当年而不织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”

② 参见《新书·无蓄》：“一夫不耕，或为之饥；一妇不织，或为之寒。”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：“丈夫丁壮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；妇人当年而不织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”

不仅如此，孔子强调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并指出：

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
君子忧道不忧贫。（《卫灵公》）

在孔子看来，农耕为稻粱而谋，不但生活没有保证（“馁在其中”），甚至因其“喻于利”而妨碍了君子“谋道”，即“学而优则仕”（《子张》）以“行其义”的政治生活。这可以说是一场具体而微的观念革命：古老的农耕政治话语就此“内裂”并发生变异而开启了新的政治话语与实践。

后世儒家继承了孔子“君子不耕”的思想，并以此反驳“异端”之说，例如孟子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中记录了孟子与当时农家的一场辩论，其略曰：

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，其徒数十人，捆屨织席以为食。陈相见孟子，道许行之言曰：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。”孟子曰：“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，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：或劳心，或劳力；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。当尧之时，洪水横流，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。尧举舜而敷治：舜使益掌火，烈山泽而焚之，禽兽逃匿；禹疏九河，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；后稷教民稼穡，树艺五谷，五谷熟而民人育。饱食暖衣，逸居无教，则近于禽兽；圣人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。尧舜之治天下，岂无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于耕耳。”

又公孙丑问：“《诗》曰：‘不素餐兮。’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君子居是国也，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，其子弟从之则孝弟

忠信。‘不素餐兮’，孰大于是？”（《尽心上》）陈相、公孙丑之问，与樊迟“请学稼”如出一辙；而孟子谓君子“不用于耕”，同时佐以“历史的论证”（其实是“古为今用”的政治神话），阐发“君子”见机而作、因时制法的“政治德性”，与孔子“焉用稼”之说一脉相承，并与《易传》作者不谋而合：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……作结绳而为罔罟，以佃以渔……
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以教天下……
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
使民宜之……垂衣裳而天下治。（《系辞下》）^①

合观孔、孟与《易传》、《礼运》作者等人所说，则儒家的立场或“自我认同”分明可知：君子以仁义耕天下，焉用稼！南宫适所谓“躬稼而有天下”，亦可作如是观^②。

对于儒家的说法和做法，“异端”如奉行神农之教的农家或道家隐者之流并不以为然。《论语·微子》篇中记载：

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蓑。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
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子
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

① 古人每以“古”证（justify）“今”为已张目，如农家称神农（说见前），法家言黄帝（参见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：“神农之世，男耕而食，妇织而衣，刑政不用而治，甲兵不起而王。神农既没，以强胜弱，以众暴寡，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、父子兄弟之礼、夫妇妃匹之合，内行刀锯，外用甲兵；故时变也。”），而儒家祖述尧舜，则以后来者居上（孔子“从周”，而后儒以孔子为“集大成”），并以“在止于至善”为号召。此远非“复古主义”，即谓之“进步主义”（progressivism）可也。

② 《论语》中孔子称禹之德，但云“尽力乎沟洫”（《泰伯》），未及“躬稼”之事。孟子称舜、禹“自耕、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庶几近之，然“自耕稼以至为帝”亦非“躬稼而有天下”之意。南宫适之意，盖指古之圣贤力行仁义而天下归心，非以力服人者，故孔子深许之。

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则行矣。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荷蓑丈人谓子路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”，正是农耕者（或道家隐者：二者并不矛盾，盖躬耕——自食其力正是隐居——自给自足的前提和基础）对儒家的严正批评（事实上这已经是被“和谐”后的版本，原话也许更加激烈^①）。对此儒家（在本文就是代为孔子答辩的子路）作了两点回应或者说反驳：首先，隐者躬耕于野（“野”与“市朝”相对，殆同西人所谓“自然状态”），然不废父子-兄弟人伦（以及主客之礼），而“父子”与“君臣”本是一体（所谓“有父子然后有君臣”），弃“君臣之义”，即败坏了人之“大伦”（亚里士多德会说这是破坏“πολιτεία”的反自然行为）；第二，君子为“行其义”而仕，“仕”则“禄在其中”，故不用耕。就此而言，君子不耕并非鄙薄农事，而是不暇于耕，或者说另有所耕，即以仁义“耕”（教化-治理）天下。后来儒家进而提出“君子不尽利以遗民”，“故君子仕则不稼”（《礼记·坊记》），更以“不耕”为让利于民而心安自得矣。

我们发现，儒家自命“不用于耕”，其根本信念在于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，所谓“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”（《中庸》），君子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儒者“怀忠信以待举，力行以待取”（《礼记·儒行》），“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然而这不过是儒者的一厢情愿罢了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如孔子本人，即有道无位，甚至于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。孔子尚且如此，其余可想而知。

① 参见《庄子·盗跖》中“盗跖”对“孔子”的批评：“尔作言造语，妄称文武，冠枝木之冠，带死牛之胁，多辞缪说，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摇唇鼓舌，擅生是非，以迷天下之主，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，妄作孝弟，而侥幸于封侯富者也。子之罪大极重，疾走归！不然，我将以子肝益昼餼之膳！”

试问(农家或道家隐者定有此问)君子不得其位或失位在野,则将如何——他还当“不耕而食”么?儒家的回答是:君子随遇而安,所谓“素富贵行乎富贵,素贫贱行乎贫贱”(《中庸》),达则齐家治国、博施济众,穷则躬耕自守、独善其身。《庄子·让王》篇载:

孔子谓颜回:“回,来!家贫居卑,胡不仕乎?”颜回对曰:“不愿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,足以给飧粥;郭内之田十亩,足以为丝麻;鼓琴足以自娱,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。回不愿仕。”

颜回以躬耕为乐,堪称孔门教外别传^①。儒家以进取用世为念,躬耕只是万不得已退求其次的选择,如《孟子·万章上》中讲述伊尹之事:

伊尹耕于有莘之野,而乐尧舜之道焉。(略)汤使人以币聘之。嚣嚣然曰:“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?我岂若处畎亩之中,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?”汤三使往聘之。既而幡然改曰:“与我处畎亩之中,由是以乐尧舜之道,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?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?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?天之生此民也,使先觉觉后知,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天民之先觉者也,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,非予觉之而谁也?”

伊尹所说,正为孟子(儒家)代言:君子躬耕,不过是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……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”(《告子下》),以便将来得君行道,“使君为尧舜之君”而“民为尧舜之民”。

① 孔子自云“吾少也贱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,既长为委吏(仓库主管)、乘田(畜牧主管),五十以后为鲁中都宰、司空、司寇,此后周游列国,晚岁归国,为鲁“国老”(如今之“老同志”)。弟子颜渊死,其父颜路请以孔子之车为槨,孔子曰:“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可徒行也。”(《先进》)其自居身份如此,“躬耕”殆无可能。所谓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”(《述而》),不过说说而已,未可当真。

得君行道是儒家的理想，但理想不等于现实。在现实政治中，儒家理想“多情总被无情恼”，甚至“花落人亡两不知”；这时，躬耕往往成为“批判现实主义”的政治话语与实践。《庄子·天地》篇中记载：

尧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。禹趋就下风，立而问焉（略）子高曰：“昔尧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畏。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后世之乱自此始矣。夫子阖行邪？无落吾事！”

上失其道，故君子（伯成子高）去之而“耕在野”；因此君子退耕，正是一种“自我异化-放逐”和“公民不服从-非暴力不合作”（civil disobedience）的政治姿态。《论语·微子》中隐者的消极避世，亦可作如是观：

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（中略）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耕而不辍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隐者躬耕“辟世”，孔子对此不以为然，正是儒宗本色^①。但是后来儒家分化，其中“亡在草泽”^②、隐逸辟世者代有其人（特别是在暴

① 其实，“耦耕”——即以友爱为前提的互助合作——正是“人伦”从家庭（夫妇-父子-兄弟关系）转向“乡党”乃至“国家”的基础和关键。参见《逸周书·大聚解》：“以国为邑，以邑为乡，以乡为间。祸灾相恤，资丧比服。五户为伍，以首为长；十夫为什，以年为长；合间立教，以威为长；合族同亲，以敬为长。饮食相约，兴弹相庸，耦耕□耘，男女有婚，坟墓相连，民乃有亲。六畜有群，室屋既完，民乃归之。”所不同者，隐者但止步于此（后来道家甚至提出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主张），而儒家则由此走向“人之大伦”。

② 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孔子卒，原宪遂亡在草泽中。”按：“亡在草泽”，即“流落草莽”（go to the greenwood），虽非“揭竿而起”，却也等于实践了“公民抗命”的政治理想。

政或乱世时期），躬耕事实上成为儒家政治生活的基底与后备方案，所谓“耕读传家”。这看似有违孔子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，但却保证了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公民自由。就此而言，躬耕不仅是一种“前政治的”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“元政治”的公民实践及其话语表征（尽管往往以反讽形式出现）。

附论：

杜甫当年仕途失意，在诗中大发牢骚：“自断此生休问天！杜曲幸有桑麻田，故将移往南山边。”（《曲江三章章五句》）躬耕的前提是“耕者有其田”：无论是舜耕于历山、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还是陶渊明“守拙归园田”、诸葛亮“躬耕于南阳”，或则只是“述而不作”的“归耕汶水滨”（李白）、“移往南山边”，他们无不先“有其田”，即拥有自己的土地（孟子所谓“恒产”，后世所谓“世业田”、“永业田”），而后可以退隐归耕。若耕者（即先前之“君子”）不幸而无其田，则又当如何？儒家以为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又云“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徼幸”（《中庸》），似乎已有答案；但如耕者无地可耕，则君子之“固穷”大非易事。事实上，这时他除了“死守善道”、饿死沟渠之外，恐怕也只能“行险以徼幸”、“不受命”如子贡^①，或“不畏死”而“革（人之）命”如盗跖了。

^① 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赐不受命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